

于南宋末年的政治发展缺乏了解的话,宋元战史也不能同样深入。在人物的发掘上,要注重真正对宋末政治产生重大影响的人物研究,同时对人物及其家族的历史发展要有一种跟进的眼光,关注其发展的脉络,从而考察持续性家族在宋、元、明等时期因时局与思想认识的变化而产生的不同表现。

(三)晚宋史的研究要结合宋元之际的变化,因篇幅有限,笔者未涉及这一部分研究成果的综述。宋史与元史学者要找到合作与对话的焦点。无疑,晚宋这一历史时期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切入视角。宋、元史学界都面临着旧史料的穷尽和新史料开发的难题,而这一时期的历史或许能为二者找到新的研究领域与方向提供有益的参考。

由于作者水平有限,文章难免挂一漏万,关于晚宋思想、文学以及晚宋遗民等问题上还少有所涉及,同时在引述学者观点时若有理解不到之处,敬请指正。

近三十年来金代佛教研究述评

王德朋

(辽宁大学历史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6)

自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教研究逐渐兴起。1980年代至今,中国佛教研究更呈日益蓬勃之势,在此过程中,金代佛教也逐渐进入学术界的视野。目前已经出版的金史著作,以宋辽夏金为研究对象的专题性著作以及一些佛教史著作都对金代佛教有所论及。但总体来看,由于篇幅和研究主旨等因素的限制,这些著作对金代佛教所做的探讨比较有限,富于见地的成果主要体现在论文及论文集当中。

一、金代佛教政策研究

很多学者以专文探讨金代的佛教政策。王宏志《略论金世宗的宗教政策》(《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9年第4期)认为金世宗对佛、道两教采取了限制又尊重、保护和利用的政策,其原因在于世宗时期佛道势力在全国已有一定影响,同时,三教合流思想对金世宗的佛教政策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武玉环《论金代女真的宗教信仰与宗教政策》(《史学集刊》1992年第2期)提出,金代的佛教,自熙宗时期开始兴盛,世宗时期采取了一些限制佛教的措施,明昌之后,金朝又放宽了对佛教的约束和限制。温金玉《辽金佛教政策与律学发展》(《佛学研究》2008,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认为,在辽金佛教文化圈中,权力机制推行着独特的宗教政策,辽代佛教的过度膨胀成为后继者金朝统治层的一条警戒线。刘浦江《辽金的佛教政策及其社会影响》(《佛学研究》1996,中国佛教文化研究所)认为,“金代社会崇佛之风依旧,但统治者鉴于辽代

佛教的消极影响,实行了利用与限制并重的佛教政策,加强对佛教教团的统治,并使其逐渐制度化。金朝佛教政策的调整导致了僧侣社会地位的跌落”。宋立恒《论金代对僧侣阶层的压制政策》(《满族研究》2009年第4期)归纳了金代对僧侣阶层采取压制政策的具体表现,并分析了执行压制僧侣政策的原因及产生的后果。

近年来涉及金代佛教历程的论文也谈到金代佛教政策问题。王新英《从石刻史料看金代佛教信仰》(《东北史地》2010年第1期)提出,虽然金代不同时期佛教政策时有变化,但就全国范围来说,抑佛政策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金代社会各阶层各民族对佛教的信仰。都兴智在《金代女真人与佛教》(《北方文物》1997年第3期)中认为女真统治者对不同宗派采取兼收并蓄的政策,“自始至终把佛教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以儒治国,以佛攻心”。

作为金代佛教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金朝曾长期推行出卖紫衣师号及僧道度牒、寺观员额制度,学术界对这一制度的研究颇为深入。冯大北、白文固两先生对此贡献尤多。白文固《金代官卖寺观名额和僧道官政策探究》(《中国史研究》2002年第1期)详细考察了金代官卖寺观名额和僧道官政策的发展过程,提出这种挖肉补疮的办法造成了各种社会弊端,使原来属于宗教文化的度牒、紫衣师号等变成了可以买卖的商品,进而破坏了僧道读经与修行的风气。冯大北《〈金代官卖寺观名额和僧道官政策探究〉补正》(《宗教学研究》2010年第3期)详细分析了官卖政策的起止时间、形成钱数差异的原因及审批程序,并同唐宋时期的相应制度做了对比。与其他研究者不同的是,冯大北认为片面强调金代官卖政策的负面意义似有失客观,官卖政策对于缓解财政危机、减轻农民负担有一定帮助,对于促进佛、道教的发展亦起到重要作用。冯大北在《金代官卖寺观名额考》(《史学月刊》2009年第10期)中也表达了类似观点。

二、金代佛教宗派、佛教人物研究

有金一代,禅宗在佛教界占主要地位,禅宗“五家七宗”中,学界都有所研究。临济、曹洞二宗在金代尤为活跃,因此,学术界对它们的研究也相对深入。其中,李辉博士用力尤勤,她的《金朝临济宗源流考》(《世界宗教研究》2011年第1期)利用大量石刻资料对临济宗在金朝的传承发展进行了疏理和考证,认为北宋临济宗分出的黄龙、杨岐两派在金朝都有传人,“临济宗在金朝佛教中占据主流地位”。李辉与冯国栋合作的《曹洞宗史上阙失的一环——以金朝石刻史料为中心的探讨》(《佛学研究》2008)详细研究了金代曹洞名僧大明宝的生平、法嗣,对大明宝之师青州希辩的生平及在曹洞宗系谱中的位置也进行了深入考证。此外,《金史》卷5曾经记载海陵杖责僧人之事,但被杖者究为何人却未明载,刘辉、冯国栋在该篇论文中通过详细考证,认定被杖之僧即为大明宝。张志军在《金代河北之曹洞宗》(《禅》2010年第4期)中分析了鹿门自觉一系的法脉,并对大明僧宝、玉山师体、雪岩慧满、万松行秀的生平及思想作了深入研究。此外,刘晓的《金元北方云门宗初探——以大圣安寺为中心》(《历史研究》2010年第6期)认为,与云门宗在北宋地区的衰落相反,金朝时期,云门宗在中国北方地区得到了继续发展,并形成以中都大圣安寺为核心的丛林集团。温金玉《辽金律宗发展大势》(《世界宗教文化》2008年第4期)简要介绍了悟敏、悟铎、法律等律学大师的生平。温玉成在《金元糠禅述略》(《法音》1988年第8期)中提出,糠禅的创始人是刘纸衣,此派最初流布于今河北、山东、

辽宁、山西各省,该教以清净寡欲、修头陀苦行、严守戒律为解脱法门。潘桂明《中国居士佛教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结合有关资料,介绍了耶律楚材对糠禅的立场和态度。

关于金代佛教人物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为僧侣,一为居士。就金代僧侣来说,目前对万松行秀的研究最为集中和深入。刘晓《万松行秀新考——以〈万松舍利塔铭〉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09年第1期)确定万松行秀的师承体系,并根据《邢台县志》所录之《万松舍利塔铭》的记载,详细勾稽了《塔铭》所涉及的诸多史事。程群、邱秩浩《万松行秀与金元佛教》(《法音》2004年第4期)主要研究万松行秀之生平、著述、学术思想及影响。释清如《万松行秀禅学思想之研究》(财团法人法鼓山文教基金会,2010年)透过对万松所著《从容录》的整理、分析与解构,不仅厘清了万松所传承的曹洞宗禅法的思想沿革与特色,同时还对万松禅学思想内涵进行了深入的剖析,确立在佛教史上为万松新的定位与朝代意义。除集中研究万松行秀等名僧外,也有一些论文对金代僧人作个案研究。王嘉元《宋金元代名僧》(《山西文史资料》1994年第4期)介绍了几位金代高僧的事迹。包世轩《金元大庆寿寺高僧寻索》(《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对金元两代大庆寿寺住持僧身世作了考证。

金代居士研究方面,学术界对李纯甫、耶律楚材着墨最多。关于李纯甫佛学思想研究,主要集中于下列几篇论文:张晶《李纯甫的佛学观念与诗学倾向》(赵维江主编《走进契丹与女真王朝的文学》,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认为,佛家思想的浸润对于李纯甫的诗学倾向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李氏“尚奇”的诗学观念与其对佛学的崇尚有深刻关系,佛学尤其是禅学,对他所主张的“文无定体”、“惟意所适”的诗学倾向颇多启悟。刘洁《李纯甫的诗学观念及其禅学渊源》(《北方文物》2010年第4期)认为李纯甫“诗无定体”、“惟意所适”的诗学主张深受禅学“以心为师”、“游戏三昧”思想的影响,他的诗文也因此成为达到禅家自由解脱境界的重要途径。封树礼《李纯甫佛学思想初探》(《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2009年第6期)以李纯甫现有著述为主要研究内容,从自报自得的因果论;淡化空有对立,强调自性空寂的空观;不离世间法的出世法;尊异求同,三教合一等四个方面对李纯甫的佛学思想进行了初步探讨。

关于耶律楚材与佛教关系研究。近年来,耶律楚材研究成果丰硕,耶律楚材的文学思想、法学思想、经济思想、儒学思想、治国思想、个人心态尽在研究范畴之内。作为金末元初最重要的佛教居士之一,学术界对其佛教思想的研究也比较深入。孟广耀《论耶律楚材的佛教思想——兼释他的“以佛治心,以儒治国”的济世方针》(《内蒙古社会科学》1981年第6期)认为,“在楚材的思想中,佛教的威望超过儒家”,“在他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佛教,而不是儒家,更不是法家”。罗贤佑《儒释思想影响与耶律楚材的心路历程》(《民族研究》1999年第3期)认为,耶律楚材最主要的精神支柱是儒家的入世信条,而不是佛家的出世禅理,支配耶律楚材一生行止的,是儒而不是佛。么书仪《面对佛道二教的耶律楚材》(《文学评论》2000年第2期)认为,在耶律楚材的观念和内心情感上,入世的儒家信条一直是他最主要的精神支柱,而佛家的出世思想只是他遇到无法排解的矛盾和遭到挫折以后的精神安慰。朋·乌恩《耶律楚材儒释道观评析》(《内蒙古社会科学》2001年第2期)提出,以儒家思想作为自己政治行动准则的耶律楚材,在理论上却藐视儒学、推崇佛教学说,这种重佛轻儒意识的产生同当时的社会思想文化潮流有密切联系,而他对道教持否定态度的直接原因在于佛教与全真道之间的矛盾。王月珽《论耶律楚材的宗儒重禅》(《内蒙古大学学报》1990年第4期)认为,耶律楚材的思想

兼有“宗儒”、“重禅”的特点,并有调和儒佛的色彩,但他实际上恪守的则是儒教的基本教义。李向平《“治天下匠”的佛教信仰——论湛然居士耶律楚材》(《社会科学家》1992年第2期)认为,耶律楚材的希望与理想,并非普渡众生的极乐佛国,而是孔孟仁政的美好实现,是尧舜圣德泽惠天下的教化新貌,而佛道之间毫无反唇相讥的必要。所谓治世治心,无非是说法不一但又殊途同归的主张。张勇《论湛然居士的和谐佛教观》(《民族文学研究》2009年第2期)指出,耶律楚材提倡禅宗内部融合、禅教融合,乃至三教融合,他从“三教同源”出发,以佛教的理论与思维方式来论证三教融合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既调和了立场上的儒佛矛盾,又在理论上坚持了佛教的本体地位。

此外,学术界对元好问、赵秉文、王寂等金代士人与佛教的关系也作了初步探讨。

关于元好问与佛教。姚乃文在《元好问与佛教》(《五台山研究》1986年第4期)中论述了元好问与诸多佛教僧人的往来以及元好问游五台山诗,剖析了元好问对佛教的认识。狄宝心、任立人《元好问对佛教文化的弘扬兼蓄》(《忻州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指出,元好问做为金元之际的文坛领袖,他以儒家文化为安身立命之所,对佛、道文化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态度,对佛家的慈善胸怀、敬业精神和文学贡献给予了充分肯定和热情赞扬。李正民、牛贵琥《试论佛教对元好问的影响》(《民族文学研究》2005年第3期)认为,元好问对佛教独特的体认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生命价值的珍惜与关爱;对生命意义的体悟与发挥;对诗禅关系的阐释与实践。

关于赵秉文与佛教的关系。方旭东《儒耶佛耶:赵秉文思想考论》(《学术月刊》2008年第12期)认为,赵秉文在《滏水集》中并不以出现与佛老有关的文字为忌。推其原因,当是因为他并不觉得语涉佛老就一定有违儒家立场,实际上,赵秉文在所有大是大非上都明确地奉行儒家准则,其本色自是儒家无疑。孟繁清《赵秉文著〈道德真经集解〉与金后期的三教融合趋势》(《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6期)认为,赵秉文所著《道德真经集解》的主旨,既以儒释道,又援佛入老,极力消解儒、道、释三者之间的壁垒,集中反映了金后期三教融合的发展趋势。

郭锐《金代文学家王寂与佛教》(《北方文物》2011年第1期)集中探讨了王寂与佛教的关系,认为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社会背景的推动,王寂身上体现了浓厚的佛教情结,佛教对王寂的交往视野、诗文创作、生活态度都产生了极大影响。

三、金代佛教文化艺术

与唐宋相比,金代佛教文学稍显冷寂,但这并不意味着金代佛教文学是一片荒漠,元好问、赵秉文、杨云翼、王若虚等金代文坛巨子创作了一大批具有强烈佛禅色彩的诗词、散文、碑铭、小说,刘达科对此作了系统研究,先后发表了论及佛禅与金代文学的论文十余篇,如《佛禅话语与金代诗学》(《社会科学战线》2009年第12期)、《耶律楚材与孔门禅》(《江苏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等,刘达科关于金代佛教文学的观点集中体现在《佛禅与金朝文学》(江苏大学出版社,2010年)中,该书从佛禅对金朝文人作家的影响、佛禅对金朝文学创作的影响、佛禅对金朝文字批评的影响三大视角切入,着重考察、阐释佛禅语境中金朝文字活动的各种现象,以期从外部规律入手揭示12—13世纪初中国北方文学的某些特征。此外,也有一些论文专门

讨论金代佛教文学。张琴《论金朝咏寺酬僧诗》(《太原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5期)将金代的咏寺酬僧诗划分为三个类型,认为这些诗歌从不同侧面反映了文人在思想情趣和生活行为上与佛禅的密切联系,以及佛禅对开拓金诗题材的重要贡献。王树林《金末诗僧性英考论》(《南通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考证了性英籍贯、行止、卒年等问题,并对性英的诗作给予高度评价,认为其“诗境清幽枯寂,风格淡远,有晚唐风”。

关于金代佛教艺术,学术界研究较多的是金代佛教壁画、石窟等。金代佛教壁画方面,山西繁峙县岩山寺金代壁画以其较高的艺术价值、较好的保存现状而受到学术界的关注。柴泽俊《岩山寺文殊殿壁画》(《五台山研究》1990年第4期)认为,壁画作者通过画面表现了丰富的宗教历史,展示了宋金时期的社会生活图卷,保留了关于古代科技史的形象资料,丰富了中国绘画史的内容。阎瑜民《论岩山寺壁画艺术》(《五台山研究》1992年第3期)从主题的表现、性质与范围、审美意识的演变、价值与意义等角度分析了岩山寺壁画在宗教、艺术、社会生活等方面的价值。陈蓉《略论岩山寺文殊殿西壁界画》(《美术观察》2011年第9期)论述了岩山寺文殊殿西壁界画与北宋院体绘画的关系。除探讨岩山寺壁画的艺术价值,还有学者着重研究该壁画在中国科技史上的贡献。徐岩红、高策《繁峙岩山寺壁画艺术中的建筑及特征》(《文艺研究》2008年第6期)从建筑艺术的角度,结合有关历史文献和中国建筑史现象,对岩山寺壁画的建筑图像进行了系统整理与研究,对壁画所展现的建筑形制及特征进行了探讨。高策、徐岩红《繁峙岩山寺壁画〈水碓磨坊图〉及其机械原理初探》(《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7年第3期)、史晓蕾《繁峙岩山寺壁画〈水碓磨坊图〉机械原理再探》(《科学技术哲学研究》2010年第6期)对岩山寺壁画《水碓磨坊图》中水磨机械的原理、结构及一些技术细节作了详细讨论。

除岩山寺外,郭华《关于资寿寺金代壁画的考证》(《名作欣赏》2011年第27期)提出山西灵石县资寿寺部分壁画为金代壁画,认为该壁画对研究金代女真服装服饰、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提供了依据。王时敏、李国华《朔州崇福寺弥陀殿壁画内容浅探》(《文物世界》2011年第1期)分析了崇福寺弥陀殿壁画的艺术风格,认为该组壁画沿袭了唐代疏阔开朗的雄浑气势,是一组承袭晚唐画风的佳作。除论文外,一些涉及山西佛教艺术的专著,如柴泽俊《山西寺观壁画》(文物出版社,1997年)也对岩山寺、崇福寺弥陀殿的金代壁画作了详细评论。

金代在石窟艺术上的建树主要表现为对前代石窟的维护和部分小规模石窟的后续开凿。辛长青《云冈石窟的金代修建工程》(《文物季刊》1994年第1期)对《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所记金皇统间修建石窟的史料进行了逐一考证,据此提出“金熙宗是金代最崇信佛教的皇帝之一”等看法。董广强、魏文斌《甘肃合水安定寺石窟调查简报》(《敦煌研究》2010年第4期)认定甘肃庆阳市合水县太白乡安定寺石窟是金代开凿的石窟,经过阜昌二年和大定十八年两次工程才完工的,洞窟形制和内容与陕西北部的宋金时期石窟有很大程度上的一致性。员安志《陕西富县石窟寺勘察报告》(《文物》1986年第6期)介绍了富县石窟寺第〇二窟内金代雕刻的佛教造像、题刻情况,认为富县石窟寺和各地金、元以前石窟造像相衔接,成为中国石刻艺术史上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金代佛教艺术的其他方面,刘变琴、刘卓《太阴寺金代雕塑艺术》(《文物世界》2010年第2期)介绍了太阴寺内三尊金代彩塑菩萨的形态、雕刻技法、艺术价值,认为太阴寺雕塑在某种

程度上荟萃了金代雕塑艺术的样式与风格,是了解民间佛教雕塑艺术的良好素材。景爱《金代飞天玉雕》(《学习与探索》1980年第1期)描述了绥滨县中兴金墓出土的金代飞天玉雕的形制特点,肯定其雕刻技法上“人物线条清楚,形象生动逼真,刀法洗炼,技巧成熟,充分地表现了金代北方雕刻艺术的特点”。周峰《辽金经幢之美》(《佛教文化》2001年第6期)认为辽金经幢之美体现在造型美、质朴美、残缺美。

四、金代佛经刊刻

近年来,学术界关于金代佛经刊刻的讨论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一是房山石经中金代刻经的问题,二是“法门寺大藏经”问题,三是赵城金藏问题。

有关房山云居寺辽金两代石经镌造事业的碑记,涉及到辽代的内容较多,涉及金代的则极为稀少,在有限的研究成果中,田福月《房山云居寺发现金代重要石刻题记》(《法音》1988年第5期)充分肯定了云居寺行宫遗址出土的《镌葬藏经总经题字号目录》碑的重要价值。黄炳章《房山石经辽金两代刻经概述》(《法音》1987年第5期)详细研究了云居寺石经中金代刻经的经末题记、刻经年代等问题,并对题记中涉及的“皇伯赵王”、“皇伯汉王”的身份进行了考证。

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发现大小不等的两种金代石碑,其小者学界称其为“法门寺藏经碑”,系金承安五年所立。李发良《金“法门寺大藏经”钩沉》(《文博》1996年第5期)通过对碑刻内容的详细分析考察,认定在中国佛教史上曾经有一部《法门寺大藏经》,该藏经的修造始于宋哲宗元祐七年,完成于金章宗承安五年。其底本,一为本寺固有装藏之轮藏,一为广泛“搜索流通”所得。杨维中《法门寺金代经藏考略——与李发良君商榷》(《文博》1998年第1期)通过考证碑文,认定此碑确切名称应为“法门寺转轮经藏记”,而非雕刻大藏经的记录。

自20世纪30年代赵城金藏被发现以来,关于赵城金藏的研究日益深入,近30年来,赵城金藏研究更是成果丰硕。王泽庆《解州版〈金藏〉募刻的重要文献——雕藏经主重修大阴寺碑考释》(《文物世界》2003年第4期)、咸增强《一座不容忽视的出版史料碑——从〈雕藏经主重修大阴寺碑〉看〈金藏〉募刻的主要人物》(《运城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均围绕《雕藏经主重修大阴寺碑》的历史意义展开探讨,前者提出《金藏》募刻劝缘的真正发起人不是崔法珍,而是她的师傅实公律师尹矧乃,后者提出《金藏》之募刻是集体之功,以崔法珍贡献最大。扈石样、扈新红《〈赵城金藏〉史迹考》(《世界宗教研究》2000年第3期),方自金、马学良、张克清《〈赵城金藏〉发现始末及其版本问题》(《图书馆建设》2010年第12期)分别围绕赵城金藏的发起、刻印、发现、保护等问题展开阐述。张德光《关于赵城〈金藏〉研考中几个问题的商榷》(《文物世界》2006年第1期)提出,《金藏》的雕刻工作,应主要以“解州天宁寺开雕大藏经板会”名义,由天宁寺寔公法师和崔法珍大师二人先后主持完成;其雕印与“平水板”的制作有密切关系;赵城《金藏》与《赵城藏》应有明确区分。何梅《〈赵城金藏〉的几个问题》(《中国典籍与文化》2008年第3期)认为,《金藏》的始刻年代应以金皇统九年(1149年)为准,《赵城金藏》中同本异译经的排序有错误并分析了产生错误的原因,此藏缺帙待补的典籍可参照元《至元法宝勘同总录》和北宋《大中祥符法宝录》补足。李际宁《〈金藏〉新资料考》(方广钊主编:

《藏外佛教文献》第三辑,宗教文化出版社,1997年)围绕在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发现的有关崔法珍刊雕《金藏》的两则题记,对“赵沅碑”及有关问题作了详细考辨,提出有关崔法珍刊刻《金藏》的传世文献,其来源无出《永乐大典》者,而《永乐大典》资料的来源,其底本应是“赵沅碑”原文。李富华《〈赵城金藏〉研究》(《世界宗教研究》1991年第4期)对现存《金藏》的施经题跋作了详细分析,提出元初补雕《金藏》的时间当在1224—1271年间,其中,补雕《金藏》最集中的年代应在1242年前后。《金藏》是《开宝藏》的覆刻藏,但《金藏》内容在《开宝藏》基础上又有新的突破。宿白《赵城金藏、弘法藏和萨迦寺发现的汉文大藏残本》(《藏传佛教寺院考古》,文物出版社,1996年)分析了元初补雕金藏经版和1959年在西藏萨迦寺发现的汉文卷子装印本大藏残本之间的关系。童玮《赵城金藏与中华大藏经》(中华书局,1989年)系统讨论了《赵城金藏》的雕刻情况以及该藏在中华藏经史上的地位。

五、金代佛教考古

佛教考古是金代佛教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文献资料记载不足的情况下,考古工作中发现的金代佛教资料显得尤为珍贵。近年来,考古界对金代寺院、佛塔进行了详细调查和发掘,学术界对发现的碑、塔、铭、记等佛教遗存进行了认真解析,产生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孙勐《浅谈北京地区金代佛教考古的发现》(《北京联合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考察金代佛教在北京地区的存在、发展状况,认为金代北京的佛教长期盛行,仍是北方地区佛教文化传播和交流的中心。陈志健《彰武金代佑先院碑为复建藏经千人邑碑考》(《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1期)分析了佑先院碑碑文的内容,研究了佑先院千人邑的组织形式、性质及社会意义。解光启《金〈太原交城县王山修建十方圆明院记〉与〈第二代体公禅师塔铭并序〉碑》(《五台山研究》2000年第2期)阐述了对《圆明院记》、《体公塔铭》的认识。许志国《金大定七年沈州双城县北范家庄西山道院宗主禅师石塔考略》(《北方文物》2004年第3期)收录了“塔铭”全文,认为该“塔铭”是研究金代大定初期沈州地区州县设置变化和宗教传播的珍贵文字资料。李逸友《呼和浩特市万部华严经塔的金代碑铭》(《考古》1979年第4期)依据万部华严经塔的金代碑铭分析了该塔所在的本州城内的街巷名称及城市布局、村落方位。任喜来、呼林贵《陕西韩城金代僧群墓》(《文博》1988年第1期)介绍了1986年发现的陕西韩城金代僧人群墓的墓葬法物、葬具、葬式及随葬物品情况。

1981年6月,辽阳市发现金世宗母亲贞懿皇后《通慧圆明大师塔铭》刻石,学术界就此展开讨论。邹宝库《辽阳市发现金代〈通慧圆明大师塔铭〉》(《考古》1984年第2期)对塔铭记事进行了诠释,张博泉《辽阳市发现金代〈通慧圆明大师塔铭〉补证》(《考古》1987年第1期)对邹文中的某些观点做了订正和补充。方殿春《金代〈通慧圆明大师塔铭〉再证》(《北方文物》2007年第1期)认为,现辽阳白塔是辽代广佑寺塔,与贞懿皇后墓塔无涉;贞懿皇后的金大清真安寺和垂庆寺当在辽阳故城之北。

以上是近30年来国内学术界关于金代佛教研究的主要情况。需要指出的是,国外学术界,主要是日本、韩国、俄罗斯、美国的一些学者也不同程度地开展了金代佛教研究工作,日本学术界对金代佛教研究所做的贡献尤为突出,胁谷摺谦、野上俊静、桂华淳祥、今井秀周的研究

成果甚至填补了金代佛教研究史的某些空白。日本学者的金代佛教研究主要集中在金代佛教政策、寺观名额官卖与金代财政、赵城金藏等几个方面。20世纪80年代以来,今井秀周、桂华淳祥集中讨论的金朝寺观名额官卖问题对中国学术界的研究极具启发意义。随着中日交往的增多,日本学术界的一些研究成果也被译成汉语介绍给中国同行,例如,桂华淳祥《关于金明昌元年〈西京普恩寺重修释迦如来成道碑〉》(《大谷学报》64卷4号,1985年),经赵云旗译成汉语后在国内学术刊物《五台山研究》1987年第1期)发表。野上俊静《辽金的佛教》译成汉语后也发表在《黑龙江文物丛刊》1981年第1期。

六、结语

总结上述研究成果可以看出,近30年来金代佛教研究取得了一些重要进展,特别是在金代佛教政策、赵城金藏等问题上的研究更为深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可忽视。

第一,有关金代僧人群体的研究相当薄弱。目前关于金代僧人的研究仅仅停留在万松行秀等极少数高僧大德的层面上,而那些为数众多的普通僧人因何出家,如何弘法,怎样生活,则极少有人涉及,这就使目前的金代僧人研究几乎成为另类版本的“金代高僧传”,所以,对金代僧人群体做整体性的,更为细微的考察是当务之急。

第二,金代僧官制度及寺庙管理研究基本处于空白状态。金代史料中,只有《大金国志》等个别古籍粗略记载了金代的僧官体系,因此,由于史料的限制,学术界还未开展金代僧官制度的系统研究。至于金代寺庙中设立哪些寺职,这些寺职又如何选授,学术界则尚未涉及。此外,寺院经济是佛教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也是寺庙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但学术界专门探讨金代寺庙经济的成果仍付阙如。

第三,佛教对金代社会生活的影响尚未做系统研究。佛教本身就是金代社会生活的一个侧面,但这一侧面非常独特,以致于佛教对社会生活的其他侧面产生过不可替代的影响。迄今为止,佛教如何影响并在多大程度上改变着金代的社会观念、生活习俗?佛法僧的信仰如何成为金代社会活动的重要内容?学术界就这些问题所进行的研究是分散的、初步的。

最后,特别令人遗憾的是,与中国历史上其他时期佛教研究的兴旺局面相比,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金代佛教史问世。

有鉴于此,今后的金代佛教史研究,应该力求在以下几个方面获得突破:

第一,应该致力于研究目标的转换。以往的金代佛教研究,论者大都着眼于对金代佛教个别问题的探讨。局部的、专题的研究虽有助于我们在个别问题上形成深刻认识,却无法显示金代佛教的全貌,因此,后来应该在此基础上对金代佛教进行整体的、综合性研究,努力探索金代佛教全貌,最终形成一部完整的金代佛教史。

第二,努力拓展研究广度和深度。以往的研究,主要着力于官方佛教政策、佛教发展走势等“大事件”,未来应该在此基础上,把金代佛教研究和这一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结合起来,力争在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对金代佛教做准确摹画。同时,更加注重寺庙功能、僧团管理、信众的组成与信仰方式等微观环节的研究,从而极大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努力触及核心,填补空白。

第三,在搜集、整理和利用金代佛教史料上做更多工作。史料是开展历史研究的基础,自汉唐迄于明清,历代佛教史料传承有序,唯金代佛教史料少如凤毛麟角,而仅有的一些史料也被湮没在碑刻、方志、文集、笔记、灯录之中,搜集起来非常困难。鉴于这种情况,未来的研究应该进一步拓宽视野,一方面从宋金元及其后的佛学典籍和相关著述中发掘更多的佛教史料,另一方面密切关注金代考古的新进展,力争从考古发现和传世金代文物中发现新的线索。

近三十年清代契约文书的刊布与研究综述

刘 洋

(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四川南充 637002)

清代契约文书一直以来备受学术界关注。契约文书是指订立发生一定权力义务关系的协议而写成的文书,诸如合同、协议书等。在古代,契约关系是民间日常生活中比较重要的关系之一,诸多事务需要通过立定契约的形式得以确定。现存的清代契约种类很多,有买卖契约、典当契约、租佃契约、借贷契约、赔偿契约等各种契约,还有赠与、分产、遗嘱、继承等各种文书。近30年来,随着考古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史学理论、方法论的日益多元化,清代大量的契约文书得以集中刊布。从契约文书发掘分布上看,全国各地都有发现,其中福建和安徽收藏最多;另有民间散落的一部分以及从族规、家谱等民间文献中誊抄的契约文书。

一、清代契约文书的收藏概况

1. 官方收藏研究概况。现存清代契约文书收藏主要分为我国官方收藏和民间收藏,以及一部分日本、美国的官方收藏。官藏契约文书主要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央档案馆和全国各省市历史档案馆中,全国总数大约有40万件左右。官方收藏的契约文书也是不断动态变化的,例如1989年北京图书馆购藏了一批清代的契约文书,共计两千余件,其内容包括地契、房契和其他契约。在此基础上,伍跃、杨晏平编撰《北图藏顺治年间契约文书十七件》(《档案》1992年第1期),从这些契约文书中,将顺治年间挑选出重要的十七件进行考察,以此反映清初民间社会的财产契约关系。顾剑徽《清代宁波契约文书》(宁波市档案局,2009年)系统地将近千件保存较为完整的清代土地买卖以及其他产权交易的契约文书编成书籍,为研究浙江省清代制度社会文化提供了资料。

近30年中,契约文书的辑校工作也颇有成果:孙伟良主编,王万盈辑校《清代宁波契约文书辑校》(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收集了一部分残缺的契约文书,其中均属手书,错字、别字、脱漏字、异体字、生僻字、数字大写乃至自造字较多,个别地方字迹已经难以辨认,为方便研